

个体量词“张”的来源与发展

麻爱民

中山大学中文系、嘉应学院师能部

提要 本文主要采用历时与共时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个体量词“张”的产生、发展、现状:个体量词“张”产生于西汉末东汉初期,并沿着“撑张”、“铺张”两条路线发展,至隋唐时期系统基本确立,宋、元至现代主要是系统的局部调整期,其发展过程具有较为鲜明的历时层次性。

关键词 个体量词、“张”、产生、发展

“张”是现代汉语中一个常用的量词,探求它的发生、发展的轨迹,有助于认识和了解汉语个体量词系统的发展规律。

一 个体量词“张”的来源

《说文》:“张,施弓弦也。”本义是把弓张开,《诗经·小雅·吉日》“既张我弓,既挟我矢”用的正是本义。在先秦文献中还经常有这样的用法,如:

- (1) 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礼记·檀弓上》)
- (2) 师田,则张幕设案。(《周礼·天官冢宰》)
- (3) 宾入门左,揖让如初,升致命,张皮。(《仪礼·聘礼》)

这里的“张”都是动词,动作涉及的对象可以是“琴”、“幕”、“皮”等。当动词“张”与不同的对象结合时,词义有所不同,大致体现两种情况,当“张”的对象是“弓”、“琴”、“幕”时,由于它们都有可开合的特点,限定“张”的动作方式是向前后或四方的引动、撑张,这里“张”是“撑张”义。当“张”的动作对象是“皮”时,对象可以铺张、张设开来,铺张、张设开来的结果往往有一个平面,这里的“张”是“铺张”义。虽然二者动作方式不同,词义有别,但它们共同的语义特征可以概括为 [+可张],当人们称量事物时,就可能将这些“可张”的事物称为“张”,这应是个体量词“张”产生的语义基础。语言事实证明,个体量词“张”的称量对象正是从“弓”、“琴”、“幕”、“皮”等“可张”物开始的,而且,从称量对象的类型看,也正是按照“撑张”和“铺张”两条路线发展的¹。

那么,个体量词“张”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学者大多举《左传》中的例子,认为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损焉。及会,亦如之。”(《左传·昭公十三年》)杨晓敏先生(1999:189)、何乐士先生(2000:332)等都列举

¹ 参见《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30-133 中华书局,1965年。

此例，确认为个体量词。这种看法单独就这个例子来说，是讲得通的，可是，从系统发展的角度来看就值得怀疑了。首先，在先秦汉语中，除此例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例子，而其后的确切例证晚见于西汉末东汉初的居延汉简中，从春秋末到西汉末东汉初，少说也有三、四百年，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众多的文献中为什么没有见到其它的例证？其次，从个体量词发展的系统看，先秦时期的个体量词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真正的个体量词不过“匹”、“乘”、“两(辆)”、“品”、“等”、“级”、“重”、“层”、“领”、“篇”、“口”等十几个，更重要的是从个体量词产生、发展的小类上看，“形状”类个体量词是相对晚出的，如“条”、“支”、“根”、“颢”等“形状”类个体量词都是汉代及汉代以后才逐渐产生的，先秦尚未出现“形状”类个体量词，“张”作为典型的“形状”类个体量词，不太可能早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那么，如果此例不是量词的话，又当作何解呢？“张”是后代传抄过程中的衍字？抑或另有别解？我们不能确定。贝罗贝先生(1998)认为这里的“张”是动词，并将这句解释为：“子产带着九个可以被张开的帐幕走了。”这也可备一说。因此，仅凭此例尚难得出个体量词“张”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的结论。可以确定的例子见于西汉末东汉初的居延汉简中，共有20个例子，全部称量“弩”，例如：“承五月余官弩二张、箭八十八发、釜一口、础二合。”(《居延汉简甲编》3011:128.1:)此例中“弩”称“张”、“箭”称“发”、“釜”称“口”，可见“张”为个体量词是没有疑问的。

汉代以后，个体量词“张”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了探求其发展变化的线索和规律，我们按照“撑张”、“铺张”两条发展线索进行描写，并对现代汉语和现代汉方言中的使用情况加以说明。

二 个体量词“张”的发展

2.1 “撑张”类用法的发展

此类用法始见于《居延汉简》只能称“弩”，可见个体量词“张”在西汉末、东汉初还只是萌芽阶段，东汉、六朝以后有所发展。

2.1.1 称量一般性物体

称量一般性物体，东汉时期已有所发展，可以称量“弩”、“弓”、“琴”、“屏风”，例如：

- (4) 北海国平寿射工徐扬，弩一张。(东汉《秦汉金文录·汉金文录·徐扬钱》)
- (5) 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东汉《汉书·匈奴传》)
- (6) 亲琴一张，常所自弹也。(东汉 秦嘉《重报妻书》)
- (7) 鸳鸯万金锦一疋，琉璃屏风一张，枕前不夜珠一枚。(东汉《赵飞燕外传》)

六朝及六朝以后，还产生了许多新的用法，六朝时期可以称“伞”、“幕”、“障”，隋唐时期可以称“旛”、“幌”、“幔”，元、明、清时期可以称“帐子”、“衣架”、“卵袋”、“网”、“旗”等，例如：

- (8) 奉教垂帟紫骝马并银钉乘具紫绸幪一张。(六朝 庾信《谢赵王贻马并幪启》)(“幪”，“伞”的异体)
- (9) 诏赐……百子帐十八具，黄布幕六张。(六朝《魏书·蠕蠕传》)
- (10) 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子八人夹车前。(六朝《幽明录》)
- (11) 五色四十九尺幡二张。(隋《国清百录》卷二)
- (12) 乌纱蚊幪一张。(隋《国清百录》卷二)
- (13) 时廷尉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唐《晋书·张湛传》)

- (14) 床上挂着一张帐子。(元《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15) 武洗要取一张衣架,一条手巾,脱了衣服。(明《西游记》第四十六回)
- (16) 入舍女婿只带着一张卵袋走。(明《二刻拍案惊奇》卷六)
- (17) 疏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水浒传》第十五回)
- (18) 白虎阵上,少了虎眼金锣二面,虎耳黄旗二张。(清《杨家将》第三十四回)

2.1.2 称量人体器官

以上是称量一般性可开合的物体,由称量一般性物体引申出称量某些可以开合的人体器官,例如:

- (19) 腊月三十日,赢得一张口。(宋《古尊宿语录》卷二十)
- (20) 又经支佩德先时只顾得自己一张嘴,如今两张嘴……。 (明《型世言》第十九回)
- (21) 就把两个肉峰,一张牝户,正正的对着窗子。(明《肉布团》第十四回)
- (22) 这个中年男子,干瘪着一张下巴,望去一脸烟色。(民国《汉奸内幕》第一辑)

此类用法始见于宋代,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并保留至现代汉语。

2.2 “铺张”类用法的发展

同“撑张”类用法相比,“铺张”类用法要晚于“撑张”类,就现有的材料看,两汉时期的用法都是“撑张”类的,还未见“铺张”类用法,“铺张”类用法始见于六朝时期²。与“撑张”类不同,“铺张”类用法所称量的物体都有一个明显的平面,有的平面部分虽然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但却是认知的焦点。根据称量对象的外形特征可以分为“典型片状物”、“非典型片状物”、“非片状物”三类。

2.2.1 典型片状物

“典型片状物”是指物体整体呈薄片状,它可以是软体的,如“纸张”、“布帛”、“毛皮”,也可以是固态的,如“瓦”、“饼”。最早的例子见于六朝,例如:

- (23) 故纸三百张。(六朝《散见简牍合辑》247)³
- (24) 以百张皮覆木筧上。(六朝《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六)
- (25) 以绵缠身,絮以五百张氈缠身。(六朝《大楼炭经》卷二)(“氈”为棉布之一种)
- (26) 唤居道著前怀中一枚文书以示居道。(六朝《金光明经》卷四)
- (27) 王即赐诸沙门人一张袈裟,革屣各一量。(六朝《比丘经》卷上)
- (28) 复更施绛欵婆罗一张。(六朝《善见律毘婆沙》卷六)
- (29) 符坚遣使送外国金箔佛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每讲会法聚。(六朝《高僧传》卷五)

六朝时期可以称“纸张”、“毛皮”、“布帛”,分别见例(23)(24)(25),这些物体还都是原材料性质的。对这些原材料进行简单的加工和处理,其形制不变或基本不变的物体仍可称

² 之所以“铺张”类用法晚于“撑张”类,可能与原型动词的语义密切程度有关。“撑张”类用法不关注动作的结果,也并不关注动作的结果是否形成一个平面,更注重动作本身,动作性更强,与原型动词语义更为密切;“铺张”类用法关注的不是动作本身而是动作所形成的结果,关注的焦点是动作结果所形成的平面,更具有静态感,与原型动词语义的密切程度不及“撑张”类。所以“铺张”类比“撑张”类晚出。

³ 1985年出土于甘肃武威旱坡滩墓葬,有“升平十三年”纪年木牍,属于东晋时期。

“张”，如例(26)称“文书”。需要注意的是例(27)、(28)、(29)，分别称“袈裟”、“钦婆罗”、“佛像”。“袈裟”也称“条衣”，是由布条拼合缝缀而成，呈长方形，单纯从形制上看，与其说是一种衣服不如说是一块长方形的布，故此可以称“张”。“钦婆罗”是一种形制与袈裟相仿的“粗衣”，论“张”也就可以理解了。例(29)“佛像”都是“绣”、“织”而成，一定是薄片状的，故也可称“张”。

六朝以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称量范围的扩大和用量的增多上，例如唐、宋时期可以称：“锦”、“继”、“毡”、“綖”、“锦被”、“帔”，元、明、清时期可以称：“纸牌”、“票”、“钞”、“状子”、“度牒”、“帖子”、“告示”、“榜文”、“券约”、“报单”、“投词”、“诗稿”、“图”、“画”、“树叶”、“羽毛”、“瓦片”，甚至“膏药”、“饼”等等，试举几例：

- (30) 锦被一张，与我为信。(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 (31) 献大珠钿、金宝瓔珞、……细白毡四十张。(宋《唐会要》卷一百)
- (32) 写了一张词状，到操江御史衙门去出告。(元《苏知县罗衫再合》)
- (33) 佛画塔图一幅，菩提树叶十张，金佛像一尊。(明《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九十九回)
- (34) 眼上罩着一块青纱，胸前贴着一张膏药。(清《绿野仙踪》第八十六回)
- (35) 忙忙的在店门口要了两张饼，吃了就要回去。(清《儿女英雄传》第四回)

称量“典型片状物”的用法最具理据性，故而是最常见、最稳定、也是具有活力的用法。

2.2.2 非典型片状物

与纸张、皮革、布帛等“典型片状物”不同，“非典型片状物”是指那些整体形状不是薄片状，但某部分呈薄片状或者物体的某个部分有个平面，而且这个平面往往是物体的关键部分或者是认知的焦点。此类用法晚于“典型片状物”的用法，始见于唐代，以称量“家具”和“其它日常用具”为主，先举称量“家具”的例子。例如：

- (36) 于西门外灌顶坛上，着一张床，留一盘食。(唐《佛说陀罗尼集经》卷四)
- (37) 丫鬟掌灯过来，抬下一张八仙卓儿。(明《醒世恒言》卷三)
- (38) 堂中挂一幅无名小画，设一张白木卧榻。(明《醒世恒言》·卷四)
- (39) 亭子中近后壁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明《西游记》第七十二回)
- (40) 童子取一张杌坐儿置于下席。(明《警世通言》卷一)(杌，小凳)
- (41) 扯过一张退光漆交椅，叫三藏坐下。(明《西游记》第十八回)

唐代可以称“床”，如例(36)，“床”是一种复杂的家具，有支架、床面、床围等几个部分组成，之所以能论“张”，是因为“床面”是主体，而且“床面”是真正起作用的部分，其它的部分是附件，“床面”也是人们认知的焦点，舍弃其它部件，直取焦点，故床可论“张”。与此相类，明代可以称“卓(桌)”、“榻”、“板凳”、“杌”、“交椅”，而且一直沿用至现代汉语。

下面是称量“其它日常用具”的例子，如：

- (42) 专以裘胡为业，货财巨万，家有绠机五百张。(唐《朝野僉载》卷三)
- (43) 僧珍独悟其旨，亦私具槽数百张。(唐《梁书·吕僧珍传》卷十一)
- (44) 弩十张，二分，陌刀十张，二分。(唐《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六)
- (45) 头边有半碗稀粥，一张折柄匙，插在碗中。(唐《芝田录》)
- (46) 我有一张犁付与农夫。(宋《钱塘遗事》卷六)

- (47) 一个敲铜盆的手情，一个向柳阴中学舞一张铍。(元《柳叶儿》)
- (48) 苦庄三顷地，扶手一张锄。(元《赵氏孤儿》第二折)
- (49) 只见天师提了一张七星宝剑在于中央。(明《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二十五回)
- (50) 只说一个矮矬子，不满三尺之长，手里舞一张铁铲。(明《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七十三回)
- (51) 两个鬼拽着一张锯。(明《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八十八回)
- (52) 老虎头…使一张大杆豹头刀。(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第三十六回)

唐代可以称“绫机(织布机)”、“橰”、“刀”、“匙”，宋、元可以称“犁”、称“铍”、“锄”，明代可以称“剑”、“铲”、“锯”，就以上物体的整体而言并不是片状物，但是“织布机”在使用时有一个工作面，所以可以称“张”。“刀”、“匙”、“橰”、“铍”、“锄”等的“头”一般是薄片状的，而且就整个物体而言这些物体的“头”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这种工具的核心部件，也是认知的焦点部分，故也可以称“张”。

另外，明、清时期还产生了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用法：

- (53) 乃是在手筒子清一色，系两张二筒、三张三筒……共十四张。(清《海上花列传》第二十六回)
- (54) 那妇人年约有叁十五六岁，一张半老脸儿，且是俏俏。(明《风流和尚》第七回)
- (55) 来了四人，红黄黑蓝四张脸面。(清《小五义》第一百七十六回)

例(53)称“麻将牌”，“麻将牌”并不是薄片状的，而是有一定厚度的长方体，所以一般称“块”。但这里为什么又可以称“张”呢？这可以从认知上得到解释，当人们打麻将时，麻将牌虽然有一定的厚度，但人们的认知焦点是放在麻将牌的牌面上，牌面成为认知的焦点，而厚度则往往被忽略，在认知上将立体的看作平面的，所以麻将牌也可以称“张”。明清时期产生了将人的脸面称“张”的用法，人的脸面不能说是薄片状的，也很难说就是个平面，但是人们在认知上将人的脸看作是一张图画时，也就可以称“张”了，这是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的方式形成的用法。

称量“非典型片状物”是从称量“典型片状物”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其理据性不及“典型片状物”，所以无论是使用的频次还是发展的稳定性都不及前者。

2.2.3 非片状物

有些既不可以“撑张”，也不可以“铺张”，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也都找不出一个明显的平面，这样的物体也可以论“张”，其中一部分是由于连类而及的“类化”所造成的，有些就只能归结为一种语言习惯，这种用法唐代还较少使用，宋代以后有所发展。

- (56) 梃，二分，二千五百张。(唐《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六)(“梃”同“棒”)
- (57) 法用木桩一张，竹檐七片，贯桩以檐而成弩，制如猎具。(宋《翠微先生北征录》卷一)
- (58) 你这张大卵儿，比了别起已大了一半。(明《浪史奇观》第七回)
- (59) 父亲在日曾做了一张大柜。(明《西游记》第八十四回)

例(56)称“梃”，“梃”即“棒”，是一种武器，这种用法很可能是从“弓”、“弩”等武器类化而来的，例(57)称“木桩”，例(58)称“大卵”(男性生殖器)可能是从“棒”引伸来的。例(59)称“大柜”应是从“床”、“桌”等家具“类化”而来。

称量“非片状物”的用法同前两种用法相比明显缺乏内在的理据性，只是通过事物外部

联系即“连类而及”所形成的用法，由于先天理据性不足，所以此类用法不多见也很不稳定，现代汉语中已经见不到这样的用法了。

三 现代汉语和汉方言中的个体量词“张”

3.1 现代汉语中的继承和淘汰

个体量词“张”，从汉代产生到今天，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发展和演变，总体上看，称量范围不断扩大，用量不断增加，汉语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用法大多被现代汉语保留了下来，可以说继承主流，但也有些用法在使用的过程中被淘汰或者被其它量词所取代。如“撑张”类用法，现代汉语中保留了“一张弓”、“一张琴”、“一张网”、“一张嘴”、“一张下巴”等用法。而称“伞”、“帐”、“屏风”的用法则被其它量词取代。现代汉语中“伞”论“把”，“帐”论“顶”，“屏风”论“扇”。“铺张”类用法中，称量“典型片状物”的用法是最具有生命力也是最为核心的用法，古代称量“纸张”、“毛皮”、“布帛”等用法大部分继承下来，不但如此，还有很强的能产性，新出现的事物如“碟片”、“磁盘”等，只要是薄片状的物体一般都可以称“张”。当然也不是没有淘汰的，如“一张被”现代汉语用“条”、“床”，“一张树叶”现代汉语用“片”，只是这种淘汰和被取代同保留下来的用法相比，只能说是局部的、个别现象了。“非典型片状物”的用法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其中“家具”类的用法多有保留，如称“床”、“桌”、“椅”、“凳”等现代汉语常用不衰，而称量“其它日常用具”的用法，除了“一张犁”的用法还保留以外，其它用法基本消失了，大部分为其它量词所取代，如“织布机”称“台”，“刀”、“剑”、“匙”、“锨”、“锄”、“铲”、“锯”称“把”，“橹”称“支”等等。“非片状物”的用法只是汉语发展史上阶段性的产物，称“棒”、“木桩”、“柜子”等用法全部淘汰，“棒”、“木桩”称“根”，“柜子”称“个”。

3.2 现代汉方言中的遗存

有些汉语史上曾经出现的用法并未保留至现代汉语，但却活跃在现代汉方言中。例如：胶辽官话山东长岛方言可以说“一张橹”，现代汉语说“一支橹”。粤语广州方言可以说“一张蚊帐”、“一张刀”，“一张被”，“一张树叶”，现代汉语则说“一顶蚊帐”、“一把刀”，“一床被”、“一片树叶”，吴语浙江绍兴方言可以说“一张旗”，现代汉语说“一面旗”。晋语山西太原方言可以说“一张铁锨”，现代汉语说“一把铁锨”等等⁴。这些方言中所保留的用法正可以和汉语史上出现的各种用法相互印证。

四 结论

第一，个体量词“张”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如果给这个发展过程作一个大致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两汉萌芽经过六朝的发展至隋唐时期，称量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是系统基本形成期；从宋、元、明、清到现代是系统形成后的局部调整、完善时期，一些用法或被淘汰或被其它量词取代，通过局部的细小的调整使得系统更为严整、细密。

第二，个体量词“张”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虚化”的过程。量词“虚化”不能从量词本身找到答案，主要从量词所称量的对象中体现出来的，其称量的范围越广，说明其概括性就越强，相应的其“虚化”的程度就越高。从“撑张”到“铺张”，从“典型片状物”到“非典型片状物”再到“非片状物”，是一个称量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量词“张”不断虚化的过程。尤其是在称量“非片状物”时，“张”的词汇意义已经不起作用了。

第三，个体量词“张”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时层次性。从[+撑张]和[+铺张]两大类看，前者的产生早于后者，[+撑张]类用法汉代就产生了，而[+铺张]类用法则始于六朝。其次从[+铺张]类用法看，从“典型片状物”到“非典型片状物”再到“非片状物”，也有其时代层

⁴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第2954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次,“典型片状物”六朝时期就非常流行了,“非典型片状物”是唐代产生的,而“非片状物”的用法唐代才开始萌芽,较多的例子是宋以后的。

第四:个体量词“张”的继承与发展,调整与淘汰是有其内在理据性的。各种用法的活跃程度和稳定性同理据性的强弱与其成正比,称量“典型片状物”理据性最强,历代沿用不衰,其次是“非典型片状物”理据性不及前者,现代汉语和现代汉方言中部分保留,而“非片状物”缺乏理据性,在现代汉语和现代汉方言中基本被淘汰。

参考文献

- (法)贝罗贝.1998.〈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语言学论丛 21》。北京:商务印书馆。
何乐士.2000.〈《左传》的数量词〉,《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世儒.1965.《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潘允中.1982.《汉语语法史概要》。郑州:中州书画社。
王力.1980.《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杨晓敏.1990.〈先秦量词及其形成与演变〉,《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 Quantifier "Zhang"

MA Aimi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describes the emergency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meaning and usage of the unit quantifier "zhang"(张), investigates its trend of development by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methods. The unit quantifier "zhang"(张) came into being between late Western Han to early East Han, and developed along the routes of "stretch" and "spread", and modern Chinese system w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until Sui-Tang periods, adjusted partially and systematically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to the modern times.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clearly diachronic layers.

Keywords unit quantifier, "zhang"(张), produce, development